

社會企業政策支持系統之初探 (註 1)



鄭勝分、劉育欣

壹、前言

2013 年 3 月 14 日，當行政院長江宜樺在行政院會聽取勞委會報告「從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到社會企業推動情形」，其認為社會企業是新興的企業型態，也是國際發展的趨勢，期盼企業能負起更多社會責任，促進社會公平並改善失業問題。從公共政策角度，此宣示顯示社會企業已經從系統議程邁入政策議程，事實上，社會企業在臺灣並非新概念，許多非營利組織基於永續發展理念，紛紛嘗試轉型為社會企業，希望藉此提供弱勢就業機會，進而具體創造社會價值，達成滿足社會與經濟雙重底線（double bottom line）目標。但檢視國內外研究可以發現，社會企業一路走來並不順遂，特別是一些協助身心障礙者與弱勢者就業的非營利組織，欲轉型成為社會企業時，不僅面臨人力與資金嚴重短缺的雙重弱勢問題，市場規模不足也限縮盈餘空間，致使社會企業常遭遇許多障礙與挑戰（Dees, 1998; Peattie & Morley, 2008; 鄭勝分、劉育欣, 2012）。從國際發展趨勢發現，面對社會企業發展障礙，政府政策工具的介入被視為支持社會企業發展的基石。然

而，或基於社會企業尚未有清晰定義，或基於政府對於社會企業內涵的不甚瞭解，政策工具雖可能是及時雨，惟若停留傳統補貼政策思維，可能使社會企業落入資源依賴的漩渦，一旦政策補貼抽離或退場，社會企業恐又面臨倒閉危機，無法落實授人以漁政策目標。

從建構完善社會福利系統的角度，適當的政策支持系統，對社會企業整體發展至關緊要，惟政策工具必須有其合法性基礎。礙於社會企業是一個相當寬廣概念，因各國政經結構不同而有差異，復以社會企業兼具社會與經濟雙重底線特質，更加深法制化困難度，導致社會企業在現實環境中，苦尋法律立足點以維持營運（OECD, 1999; Shaw & Carter, 2007）。缺乏法制化結果，造成社會企業組織定位欠缺穩定性，部份選擇在非營利組織下設事業體，例如喜憨兒基金會的餐坊，部份則選擇公司登記，例如黑暗對話社會企業股份公司，然兩種社會企業形態牽涉不同治理模式，不僅須考量治理成本問題，稅賦負擔亦大不相同，且若直接以公司登記成立社會企業，也可能將自身摒除於政府補助之外，即使收支得以平衡自足，也難有機會擴大社會

影響力，增加社會參與機會，遑論提供弱勢就業者就業之社會企業，營運情況愈顯艱困。

由於社會企業欠缺法制基礎，加上社會企業混合(hybrid)特質，致使社會企業難以在非營利組織或營利公司之外找到自我定位，當越來越多社會企業成立後，定位不明即成為不得不面對的難題。有鑑於社會企業法制化欠缺期待性，許多社會企業遂進行另一波的再轉型，非營利組織和企業轉型社會企業後，又朝向成立公司或基金會邁進，以期獲得法理保障穩定組織營運，例如勝利潛能發展中心成功加盟全家便利店後，開始思考直接成立公司以符合目前法制，而大誌文化(The Big Issues)，雖先以公司登記協助遊民及身心障礙者就業，但未來希望成立基金會，則是基於交叉補貼考量，希望能獲得大眾捐款支持。

基於上述社會企業面臨問題，建立社會企業的政策支持系統，實為我國社會企業發展必須慎思的重要課題。據此，本文擬藉各國社會企業發展經驗，及其相對應政策，據以分析建構我國社會企業支持系統之可能性。依據研究目的，以下首先分析重要國家社會企業政策支持經驗；其次，檢視我國社會企業發展現況，並參照重要國家經驗，探討有助於社會企業發展政策支持模式；最後歸納研究所得，提出促進我國社會企業發展之初步建議。

貳、重要國家社會企業政策支持經驗分析

社會企業的浮現，源於七零年代間，歐

美國家為因應失業問題與財政困境所衍生出的概念，主要目的係希望透過第三部門功能，彌補政府失靈問題(鄭勝分，2007)。檢視各國社會企業發展脈絡發現，社會企業概念雖寬廣，仍可歸納出兩種發展軌跡，一為非營利組織師法企業，範圍包含各類基金會、協會或互助會等，另一則為企業師法非營利組織，類型涵蓋一般公司與合作社等(OECD, 1999; 鄭勝分，2007)。兩種社會企業發展軌跡，其核心政策為透過稅賦優惠或政策補貼方式，奠定社會企業政策支持基礎。

就非營利組織師法企業而言，主要有兩種解釋觀點，首先是非營利組織商業化，係指藉由商業活動創造收益，以交叉補貼方式支撐社會目標，減緩政府補助不足與外界捐贈不穩定情況，增進營運自主性(Dees & Elias, 1998)；其次則是強調社會企業家精神(social entrepreneurship)，著重如何透過社會創新滿足弱勢市場需求，甚至創造嶄新社會價值，例如 Ashoka 基金會即屬此類組織(Austin et al, 2006; Dees & Anderson, 2006; Defourny & Nyssens, 2010)。由於非營利組織師法企業目的，在於創造收益並達成社會目標，而非追逐最大獲利(profit)，故政策支持聚焦於透過稅賦優惠減少財務壓力，不僅能彌補競爭力不足問題，降低政府干預情況，也可減少過去非營利組織商業化所引發不公平競爭疑慮(Kerlin, 2006)。以美國國內稅法法則(IRC)之「非業務相關收入稅」(unrelated business income tax, UBIT)為例，當商業活動無關乎組織使命時，相關營收仍需依法課稅，反之，經主管機關認定商業活動符合非營利組織使命時，則可享有營業稅減免優惠(Doeringer,

2010; Weisbrod, 1998)。

在企業師法非營利組織方面，主要發展可分別從社會經濟 (social economy) 與企業社會責任 (CSR) 探討。前者延續歐陸工作整合目的，強調企業或合作社如何經由雇用遭勞動市場排除者，解決失業造成的社會問題 (鄭勝分，2005)；後者則希望企業跨足非營利領域，不僅能享有稅賦減免，也可藉此建立企業形象以維持信譽，甚至有利於組織整合與創新，達成永續發展理念 (Aguilera et al., 2007; Wymer & Samu, 2003)。對企業而言，為鼓勵企業雇用弱勢者與身心障礙者，政策傾向透過薪資補貼或稅賦優惠方式，彌補生產力不足部分，前者如芬蘭於 2003 頒布社會企業法案 (Act on Social Enterprises)，(註 2) 希望透過補貼弱勢就業者薪資，減少社會企業營運負擔 (Galera & Borzaga, 2009)；後者如義大利社會合作社法，明訂社會企業雇用若干比例弱勢就業者，得以享有稅賦優惠 (OECD, 1999)。

稅賦優惠與薪資補貼一直是各國政府支持社會企業發展的主要政策工具，然而社會企業發展依然遭遇許多問題，顯現這些支持系統並未發揮預期成效。因此一些大力推動社會企業的國家，開始嘗試立法手段，例如，英國的「公共服務 (社會價值) 法」 (Public Services (Social Value) Act 2012) 透過公共服務優先採購支持社會企業，南韓則頒布「社會企業促進法」 (Social Enterprise Promotion Act)，嚴格規範社會企業類型，奠定政策支持正當性；部份國家從政策方面支持社會企業發展，如新加坡成立社會與家庭發展部 (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MSF)，(註 3) 統籌規劃社會企業支持政策，減少社會企業發展障礙，而中國大陸則嘗試從創新角度，由政府主導舉辦公益創投 (venture philanthropy)，激發社會創新方案，滿足社區服務需求。

英國自布萊爾新工黨政府以來，即相當重視社會企業發展，祭出諸多政策試圖排除社會企業發展障礙，2012 年所通過的「公共服務 (社會價值) 法」，確保未來政府採購方面能建立在社會、經濟和環境福祉三重底線 (triple bottom line) 基礎上。該法案原由國會議員 Chris White 於 2011 年提出的「公共服務 (社會價值與社會企業) 草案」 (Public Services (Social Enterprise and Social Value) Bill)，主要為考量英國政府每年花費大筆資金採購，但採購依據是比較市場價格，而非考量如何透過政府採購創造價值，例如增進弱勢就業、刺激地方經濟以及達成環境保護使命，故希望透過此法案，一方面改善政府採購問題，另一方面延續布萊爾政府中間偏左政治理念，確保社會企業地位。

「公共服務 (社會價值) 法」雖一改傳統補貼角色，嘗試運用公私協力概念促進民間力量創造社會價值，然而若檢視立法過程，可發現英國政府對社會企業態度開始轉向，關鍵在法案辯論階段，公民社會辦公室 (The Office for Civil Society) 部長 Nick Hurd 成功提案移除草案名稱中關於「社會企業」部分，希望以更寬廣視野看待政府與企業關係。(註 4) 此舉雖未直接否定社會企業的價值，但公共服務優先採購實質上並無助於促進社會企業發展，只是規範政府採購時需遵照社會價值的原則。

細究卡麥隆政府對「公共服務（社會價值）法」的態度，可以嗅出逐漸右傾的政策走向。就政策層面而言，當布萊爾政府標舉「中間偏左」路線後，社會企業就成為英國重要的福利政策思維，社會企業強調社會目標優先，並輔以具備市場競爭力的商業經營模式，即為突破傳統殘補性福利政策思維的窠臼，以協助弱勢就業或創業取代救濟，故一時蔚為風潮。然而，當政黨輪替後，卡麥隆政府延續柴契爾夫人以降之新右派主張，政府逐步退出福利管制，回歸以市場機制提供公共服務。故卡麥隆政府試圖提供寬廣支持架構，鼓勵企業承擔更多責任，卻也可能因此造成政策失焦問題，畢竟社會價值與股東利益之間難以截然區隔，社會價值概念亦模糊不清，太過關注企業社會責任結果，反而可能忽略社會企業面臨的障礙，社會企業仍須獨立面對競爭弱勢的困境。

南韓在亞洲金融風暴後，為改善社會中存在大量非典型就業問題（non-salaried job），於 2006 年頒布社會企業促進法，逐步推動社會企業發展，期望達成工作整合目標（Defourny & Kim, 2011）。檢視社會企業促進法特色，在於嚴格規範社會企業類型，解決社會企業地位曖昧不明問題，並確認主管機關權責，重要工作項目包含認證社會企業，以及制定社會企業相關支持計畫（Bidet & Eum, 2011）。在南韓嚴謹立法規範下，雖提供政策支持社會企業正當性基礎，但追蹤立法後相關政策發現，具體配套措施仍付之闕如，顯現南韓尚未正視社會企業問題，且社會企業多以工作整合為目標，缺乏尋求社會創新可能性，導致社會企業空間與機會一再受到限制。

為彌補法規不足，南韓就業與勞工部（Ministry of Employment and Labor, MOEL）於 2012 年 12 月 24 日宣布第二階段促進社會企業計畫，（註 5）未來政策具體目標包含四項，分別為強化社會企業能力、建立合適支持系統，擴展社會企業角色，以及加強企業與社區的夥伴關係，希望藉此彌補社會企業促進法不足之處（MOEL, 2013）。其中「建立合適支持系統」，目的就在協助社會企業渡過經營難關，相關作法包含提供諮詢管道、加強社會企業營運能力與基礎設備、擴大人才培訓與其他後續支援；而「擴展社會企業角色」目標內含，也企圖透過探尋成功社會企業模式，促進社會企業多元發展空間，化解法規僵化問題。

有別於英國與南韓的立法途徑，新加坡則透過建構社會企業彈性支持體系，以減少社會企業發展障礙。新加坡政府視社會企業為造福弱勢族群，及帶動社會變革的商業活動，檢視新加坡社會企業政策最大特色，在於政府積極正視社會企業長期以來所面臨障礙，不僅成立社會企業協會（Social Enterprise Association）作為中介組織支持社會企業發展，亦跳脫長期補貼政策觀點，拓寬融資管道解決資金問題。具體政策措施包含成立社會企業協會，提供培訓與業務諮詢，協助社會企業創設與營運，另設立社區企業基金（ComCare Enterprise Fund）作為發展社會企業種子基金，減少初創時期資金不足問題，更整合中小企業金融部門，擴大社會企業融資體系，提供社會企業或青年社會創業家微型貸款服務（Social Enterprise Association, 2011）。

至於中國大陸方面，則試圖運用公益創

投概念，作為發展社會企業政策工具，期望改善社會組織資源不足問題，進而刺激創新社會方案，以滿足日漸擴張的社區需求。公益創投近年來頗受社會企業重視，主要意義在於運用創投策略，透過資金挹注及能力建構，協助社會企業建立商業模式，化解長期以來資源弱勢困境（劉育欣、鄭勝分，2013）。在中國大陸政府支持下，公益創投成為激勵社會價值的引擎，目前有兩種系統持續運作，分別是「上海社區公益創投」以及「南京玄武區公益創投」（王世軍，2012）。上海社區公益創投係由上海市民政局於 2009 年舉辦，上海浦東非營利組織發展中心（NPI 恩派）承辦，資助領域涵蓋高齡、青少年、身心障礙、就業服務、社會救助與其他公益服務等項目，資助方案期限不超過一年，資助金額不超過 20 萬人民幣，至 2012 年已累積超過 150 項社會方案；南京玄武區公益創投則由南京玄武區民政局與江蘇華益社會組織評估中心於 2011 年協力舉辦，初期計畫以試探性方式，在社區服務項目中另增加公益創投，資助領域包含高齡、身心障礙、兒童、教育、衛生與流動人口，由於成果顯著逐漸成為省級政策，至今已辦理三屆活動（王世軍，2012）。中國大陸公益創投運用創投策略取代傳統政策補貼，不僅有助化解非營利組織資源依賴問題，也能避開法制框架，促進社會價值多元發展。

參、我國社會企業政策支持系統分析

前述各國重要經驗可發現，稅賦優惠與

薪資補貼長期以來是發展社會企業基石，然而卻未實際解決社會企業的困境。英國與南韓立法保障社會企業發展，但法制化過程既耗時也易產生僵化問題，若缺乏具體配套措施，社會企業仍需獨立面對經營困境。相對地，新加坡雖未立法，轉而設立社會企業協會與放寬融資管道，以實際行動解決社會企業營運障礙，而中國大陸則透過公益創投培植弱勢社會組織，激發創新社會價值，兩者均有助於在法制化選擇外，支持社會企業發展。

檢視我國社會企業近幾年發展情況，多數非營利組織轉型為社會企業，政府補助依然扮演關鍵角色，歸納現行相關社會企業政策中，勞政體系有「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臺北市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服務實施辦法」與「推廣社會企業永續發展行動方案」三項重要政策，目的為透過非營利組織與庇護工場促進弱勢就業機會；內政部則辦理「儲蓄互助培力--平民銀行」試行計畫，提供弱勢者金融服務；文化部透過「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以及由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以下簡稱國藝會）所主導「藝文社會企業創新育成扶植計畫」，促進創新與多元文化產業發展。

在勞政體系方面，社會企業支持政策範圍涉及非營利組織、庇護性就業與社區產業。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為我國社會企業支持系統濫觴，自 2011 年 12 月成立臨時性編組「社會經濟推動辦公室」以來，政策方向開始聚焦於協助經濟型就業開發方案轉型社會企業，希望透過對經常門補助彌補社會企業產能，減少資源依賴情況（林三貴，2010）。

「臺北市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服務實施辦法」係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為進一步促進弱勢就業機會，於 2011 年始在計劃中增列「其他」乙項，鼓勵庇護工場轉型社會企業，2013 年社會企業方案資助單位包含喜憨兒麵膳坊、喜憨兒烘焙餐廳、勝利全家便利商店台大二活店、康有清潔服務與陽光汽車美容連鎖店。「推廣社會企業永續發展行動方案」則屬探索性政策計畫，由勞委會泰山職業訓練中心主導，目的乃希望結合一般企業與非營利組織力量，尋找可供社會企業永續發展商業模式，作為帶動相關產業指標。

在內政部方面，以「儲蓄互助培力--平民銀行」試行計畫最具代表性。該計畫精神類似 Muhammad Yunus 所創辦鄉村銀行（Grameen Bank），同樣為新型態基層融資與儲蓄系統，一方面提供遭金融體系排除者融資與借貸服務，另一方面運用儲蓄互助社累積信用與資產，鼓勵養成儲蓄習慣，當用戶透過儲蓄累積一定信評後，則可透過微型貸款，獲取創業資金改善貧窮情況。該計畫以中部為試行區域，預計執行至 2013 年底止，由各相關單位推薦有工作意願與能力者 50 名，以有社工輔導之原住民、新住民及其他經濟弱勢者為優先對象，而承辦之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可獲得貸款年息與手續費 3% 的補貼。（註 6）平民銀行試行計畫的政策意義在於，開始重視基層金融體系在脫貧中之角色，結合社福與合作社系統建立金融安全網，打破因高額利息所產生的貧者愈貧的結構性困境。

在文化部方面，相關社會企業支持政策最大特色，在於嘗試引入創投概念，積極推動藝文產業發展。其中，由文創發展司訂立

「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計畫」，目的即希望透過創投資金，打造具國際競爭力之文創產業，截至 2012 年底已核准 13 個申請投資案，投資金額超過 4 億，吸引民間創投資金超過 5 億（註 7）；至於國藝會自 2011 年以來即大力推動「藝文社會企業創新育成扶植計畫」，吸引企業力量投入公益創投，透過專業支援與種子基金策略，使藝文產業建立自給自足商業模式，減少營運障礙和倒閉風險（註 8）。由此可見，我國社會企業政策方向，已逐漸從政府單方面補貼，轉而擴大企業社會投資角色，顯見公益創投有機會成為社會企業政策支持利器。

大抵而言，檢視我國社會企業發展情況，可歸納三點特色。首先，我國社會企業重心仍多集中於弱勢就業，非營利組織與庇護工場乃當前我國發展社會企業主軸，但近年來合作社與一般企業也逐漸受到重視，且領域擴及至文化藝術類，顯見我國社會企業正朝向多元化發展；其次，現行社會企業支持政策雖逐漸豐富，卻分散於各政府系統中，缺乏專責主管機關主導發展，不僅易造成政策資源分散情況，也難建立具整合性政策支持系統；第三，除文化部採取投資創業觀點外，其他政策多從需求面看待社會企業發展，傾向以資金補貼彌補社會企業資源不足情況，並未積極面對社會企業發展困境，故如何為社會企業建立具體可行商業模式，實為我國社會企業政策支持系統亟待克服的核心問題。

肆、結語

檢視重要國家社會企業發展軌跡，無論

是就業與創業模式，社會企業的混合特質，雖賦予社會企業發展的彈性空間，但也造成定義的模糊不清，致使法制化不易問題。是以，與其在寬廣社會企業範圍中，苦尋精確法理定義，等待曠日廢時立法程序，不如先思考建立具整合性與靈活性的政策支持系統，或許更具可行性，換言之，優先問題不在於要成立甚麼樣的社會企業，而是如何支持社會企業發展，以利實踐授人以漁的政策目標。基於此，本文認為我國社會企業政策方向，可以關注下列幾個面向：

一、設立專責推動機構

歸納重要國家經驗可知，設立專責主管機關有助於推動社會企業發展。因此，我國可效法英國或新加坡，設立行政院層級主管機關或矩陣式推動小組，規劃整合性社會企業支持政策，期望能藉此整合相關部會，避免各部會本位主義，以提升政策資源效益。

目前我國推動社會企業較力者應為勞委會社會經濟推動辦公室，但檢視相關政策內涵多側重於弱勢就業系統，尚未提供經濟性支持措施，實有必要在弱勢就業體系外，探尋可供社會企業解決經濟問題主管單位，例如，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多年來協助中小企業發展，具備豐富創業與投資經驗，宜適合扮演提供社會企業創業與融資的角色。

二、架構適當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可從保守性的資金補貼，延伸至更積極性的公益創投，形成政策支持光譜系統。依庇護工場、非營利組織、合作社與一般企業四種不同型態組織，給予合適且具彈性的支援服務，以求能解決我國社會企業發展困境，也可避免法制化產生僵化問題，促進社會企業創新與多元發展（見圖一）。以下就資金補貼面、創業融資面與公共採購面說明政策方向。

組織 \ 支持	社會目標 ← → 經濟目標				
	資金補貼	稅賦優惠	公益創投	微型貸款	企業投資
庇護工場	◎	◎	◎	◎	△
非營利組織	○	◎	◎	◎	△
合作社	○	◎	◎	◎	◎
一般企業	△	△	◎	◎	◎

◎很適合 ○適合 △有待商榷

圖一 我國社會企業政策支持系統光譜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一) 政策補貼面

主要目標在於透過適時提供資源，減少

營運上財務問題，較適用於庇護工場、非營利組織與合作社。由於庇護工場雇用對象多為身心障礙者，產能明顯不具市場競爭力，

因此並非所有庇護工場均可轉型為社會企業，而有能力轉型為社會企業單位，也需要針對高功能者進行長期訓練方能進入職場，因此資金補貼能適時紓緩資源窘困情況；對非營利組織而言，轉型社會企業動機在於創造收益，減少政府補助與社會捐贈不穩定風險，因此資金補貼宜採取逐年遞減補助原則，目的係協助部分非營利組織度過資金窘困的過渡階段，邁向自給自足目標；合作社雖具公司法地位，但若轉型為社會合作社即具備社會目標，故短期利息與薪資補貼，有助減輕社會合作社財務壓力，促進弱勢創業與就業機會。

在稅賦優惠方面，可嘗試效法美國 UBIT 稅法精神，目的係為減少稅賦負擔，增加產業競爭力，鼓勵社會企業商業化能同時滿足社會或環境目標。因此稅賦優惠乃是社會企業發展的重要誘因工具，適用範圍可涵蓋庇護工場、非營利組織與合作社。至於企業方面，目前雖有「經濟部輔導及獎勵主管事業機構成立關係企業僱用身心障礙者辦法」，鼓勵企業僱用身心障礙者，實際上並無實質經濟補貼措施，原因乃資金補貼與稅賦優惠可能產生不公平競爭疑慮，因此除非社會企業有法制化基礎，否則可行性仍有待商榷。

(二) 創業融資面

以創業融資面為政策主軸方向，包含公益創投與微型貸款。公益創投主要目標，係透過資金挹注與專業支援，彌補社會企業資源弱勢情況，協助其建立商業模式，適用對象包含庇護工場、非營利組織、合作社，甚至是一般社會企業家。公益創投不僅能適時提供社會企業各階段營運需求，跳脫資源不

足困境，亦可藉創投精神激發社會創新方案，是各種支持系統中，最具彈性與策略性支援方式，惟公益創投運作複雜，且需長期高度參與社會企業運作，加上缺乏適當評估指標，恐難評斷公益創投社會效益，此為發展公益創投需考量問題。因此，在具體政策制定前，政府可先透過人才培育措施，培訓首批公益創投種子教練，累積相關經驗以厚實政策支持基礎。

在微型貸款方面，我國可參照新加坡經驗拓展融資管道，擴大平民銀行服務範圍，提供社會企業與社會企業家，甚至具備創業能力弱勢者更多的金融服務，使其得以順利獲取創業基金，或穩定營運所需現金流量，減少因周轉不靈而倒閉風險。為打造強而有力創業融資系統，使公益創投與微型貸款成為支持社會企業基石，政策不應忽視企業資源重要性，可適時評估企業在創業融資方面能扮演的角色與功能，著重於如何提出誘因機制吸引企業參與，讓企業願意參與投資有獲利潛力社會企業與社會企業家，以奠定社會企業品牌形象。

(三) 公共採購面

公共採購面涉及法制化問題，但從英國「公共服務（社會價值）法」可發現，該法範圍並未侷限於社會企業，僅確立政府支持原則，以寬廣視野促進社會企業多元發展。目前我國類似政策有「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其中第四章第 11 條規定「辦理位於原住民地區未達政府採購法公告金額之採購，應由原住民個人、機構、法人或團體承包」，與第 12 條規定「依政府採購法得標之廠商，

於國內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者，應於履約期間僱用原住民，其人數不得低於總人數百分之一」，均為公共工程及政府採購保障，未來我國可參照「公共服務（社會價值）法」思維，嘗試以「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為基礎，從公共服務優先採購著手支持社會企業。惟須考量執行面問題，主要問題在於「原住民工作權保障法」係用原住民身分做為區隔，若比照此項保障模式，需依「原住民身分法」嚴謹的身份認定標準，以界定出政策

支持標準與範圍，一旦納入社會企業體系，則勢必得增加有助於促進弱勢者或身心障礙者就業之目標，或鼓勵社會企業提高原住民員工雇用比例，建立社會企業政策支持合法性，避免不公平競爭問題。

（本文作者：鄭勝分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助理教授；劉育欣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博士生）

關鍵詞：社會企業、非營利組織、公益創投、微型貸款

註釋

- 註 1：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政府補助遞減對非營利組織發展社會企業之影響」（計畫編號：101-2410-H-003-035-MY2）部分研究成果，並感謝審查者的寶貴意見。
- 註 2：芬蘭所頒布社會企業法，實際上仍延續社會經濟傳統，以促進弱勢就業為立法宗旨，並未清楚規範社會企業類型。該法所稱之社會企業必須依營利事業登記，所雇用弱勢或身心障礙員工，須超過整體員工 30% 以上。該法案可見網址：<http://www.finlex.fi/en/laki/kaannokset/2003/en20031351.pdf>。
- 註 3：社會與家庭發展部前身為社青體部（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Youth and Sports, MCYS），係於 2012 年 11 月整併而成，青年與社區部門併入「文化、社區與青年部」（Ministry of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 MCCY）。相關資料可參考該部會網址：<http://app.msf.gov.sg/MSFHome.aspx>。
- 註 4：相關資料可參考英國議會關於「公共服務（社會價值）法案」立法階段與辯論，網址：<http://services.parliament.uk/bills/2010-12/publicservicessocialvalue/stages.html>。
- 註 5：第一次促進計畫宣布於 2010 年 6 月，該計畫提出三項施政方向，包含拓展社會企業資金與補貼管道；增進社會企業透明度，履行應有社會責任；聯合政府與民間力量，共同引領社會企業發展。相關資料可參考 MOEL 網址：http://www.moel.go.kr/english/topic/employment_policy_view.jsp?idx=790。
- 註 6：「儲蓄互助培力--平民銀行」試行計畫相關資料可參考內政部合作事業入口網址：coop.moi.gov.tw/news/attach%5Ccems1351147918093.doc。
- 註 7：「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畫」相關資料可參考文化部網址：<http://www.moc.gov.tw/business.do?method=list&id=13>。

註 8：「藝文社會企業創新育成扶植計畫」相關資料可參考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2011 年報，網址：<http://www.ncafro.org.tw/Upload/2011chinese.pdf>。

📖 參考文獻

- 林三貴 (2010)。2010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故事集。臺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 王世軍 (2012 年 10 月)。公益創投與社會組織培育。發表於兩岸三地社會企業學術暨實務研討會，臺灣大學應用力學館國際會議廳。
- 劉育欣、鄭勝分 (2013 年 5 月)。公益創投：商業創投的另一種思維。發表於 2013 創新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實踐大學國際會議廳。
- 鄭勝分 (2005)。歐美社會企業發展及其在臺灣應用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論文。
- 鄭勝分 (2007)。社會企業的概念分析。政策研究學報，7，65-108。
- 鄭勝分、劉育欣 (2012)。社會企業與弱勢就業：策略與挑戰。就業安全，11 (2)，53-59。
- Aguilera, R. V., Rupp, D. E., Williams, C. A., & Ganapathi, J. (2007). Putting the S back 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multilevel theory of social changes in organiz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2(3), 836-863.
- Austin, J., Stevenson, H., & Wei-Skillern, J. (2006). Social and commercial entrepreneurship: Same, different, or both?.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0(1), 1-23.
- Bidet, E., & Eum, H. S. (2011). Social enterprise in South Korea: history and diversity. *Social Enterprise Journal*, 7(1), 69-85.
- Galera G., & Borzaga, C. (2009). Social enterprise. An international overview of its conceptual evolution and legal implementation. *Social Enterprise Journal*, 5(3), 210-228.
- Dees, J. G. (1998). Enterprising nonprofit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6(1), 54-66.
- Dees, J. G., & Anderson, B. (2006). Framing a Theory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Building on Two Schools of Practice and Thought. ARNOVA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1(3), 1-28.
- Dees, J. G., & Elias, J. (1998). The Challenges of Combining Social and Commercial Enterprise.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 8(1), 165-178.
- Defourny, J., & Kim, S. Y. (2011). Emerging Models of Social Enterprise in Eastern Asia: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Social Enterprise Journal*, 7(1), 86-111.
- Defourny, J., & Nyssens, M. (2010). Conceptions of Social Enterprise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vergences and Divergences. *Journal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1(1), 32-53.

- Doeringer, M. F. (2010). Fostering Social Enterprise: an historical and International analysis. *Duk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Law*, 20, 291-329.
- Kerlin, J. A. (2006). Social Enterpr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Understanding and learning from the differences. *Voluntas*, 17, 247-263.
- MOEL. (2013). *Government announces 2nd basic plan to promote social enterprises (2013-2017)*. Retrieved May 18, 2013, from http://www.moel.go.kr/english/topic/employment_policy_view.jsp?idx=962
- OECD. (1999). *Social Enterprises*. OECD.
- Peattie, K., & Morley, A. (2008). Eight paradoxes of the social enterprise research agenda. *Social Enterprise Journal*, 4(2), 91-107.
- Shaw, E., & Carter, S. (2007).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Theoretical antecedent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entrepreneurial processes and outcomes.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14, 418-434.
- Social Enterprise Association. (2011). *Starting a social enterprise in singapore: The essential toolkit*. Retrieved May 18, 2013, from http://www.sedc-seassociation.sg/sea/slot/u2/Resources/SEDC_Toolkit%20v5.pdf.
- Weisbrod, B. A. (1998). *To Profit or not to Profit: The Commerc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ymer, W. W., & Samu, S. (2003). Dimensions of Business and Nonprofit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Nonprofit & Public Sector Marketing*, 11(1), 3-22.